

国外家族企业代理理论研究新进展

史煜筠

(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 杭州 310058)

摘 要:基于私有产权、两权合一和家族管理特征的考虑,传统代理理论把家族企业视为治理信任和降低代理成本的高效率制度安排。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当父母对子女的不对称的利他主义与私人所有权、所有者管理等特征相互交织时,家族企业凸现自我控制问题,这削弱了正式治理机制的效率。因此,家族企业同样面临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要挟等代理问题。嵌入在血缘和利他主义中的家族和企业两大系统的相互作用,使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更加复杂化,也给家族企业治理提出了难题。

关键词:家族企业;代理理论;利他主义;自我控制

中图分类号:F0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08)06-0117-05

虽然近几年来家族企业的理论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成果也纷纷涌现,但是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许多问题还没解决,该领域的理论基础和分类系统也需要进一步发展。目前家族企业研究的理论视角大致可以分成两类:战略管理的视角和面向家族企业理论的视角^[1]。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两种或更多种涉及战略管理、财务和经济学等领域的理论视角,这些视角也主要集中在以资源基础论为代表的战略理论和以代理理论为主的企业理论的交融等方面。本文沿袭新制度经济学的思路,评述代理理论在家族企业研究中的一些进展。

1 传统代理理论的假设和内涵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Arrow-Debreu 模式的一般均衡理论占据主导地位,企业被视为一个简单的生产函数、一个黑箱。

不满于黑箱观点的现代企业理论的主流——契约理论则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是一个“由它所拥有或控制的资产(如机器、存货)所组成”^[2]的利用“权威”方式来配置资源的特殊装置,是

“围绕关键性资源而生成的”、“难以被市场复制的专用性投资的网络”^[3]。这种企业契约观的提出,逐渐发展成为企业理论的主流学说。

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契约理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两大领域^[4]: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代理理论。前者以交易为分析单位,以交易费用为出发点,探讨企业和市场的关系,如间接定价理论、资产专用性和一体化等。后者主要探讨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企业中的代理关系。

70 年代以后,经典的代理理论成为研究契约和企业理论的主流^[5]。

对于代理问题的分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作为掌管他人钱财的管理者,不能期望(广泛持股公司的)他如在私人合伙(企业)中看管自己财物的人那样急切警惕地看管(公众投资者的财物)”。而 Berle 和 Means 所看到并被其称为“经理革命”的事实进一步论证了亚当·斯密论断的精辟性。遵照 Berle 和 Means 的思路,由于经营者和所有者的利益分歧,机会主义倾向的经营者将追求自己的私利,而非所有者的利益。Ross

收稿日期:2008-02-02

基金项目: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与持续成长实证研究”(20050335001);浙江省教育厅资助项目“家族所有、管理和控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2006153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史煜筠(1971—),男,浙江嵊州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企业组织公司治理、家族企业管理。

照张维迎的理论和分类,代理理论分为委托代理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前者主要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和手段,分析在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合同激励代理人,代表者如 Wilson (1969)、Spence 和 Zeckhauser (1971)、Ross (1973)、Mirrless (1974,1976)、Holmstrom (1979,1982),而后者以 Jensen 和 Meckling (1976)为代表,主要探讨两权分离下的代理成本问题以及治理方法。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所有结论来自严格的正式模型,更加形式化和数学化,但两者关心的问题没有实质的差别。本文所提及的代理理论侧重后者,即代理成本理论。

首先把这种情况称为委托 - 代理问题,并构建了一个数学模型^[6]。Jensen 和 Meckling 把这种思想应用到资本结构决策,并把所有管理者与所有者利益冲突的行动以及所有为了使管理者和股东利益协调所采取的行动、激励、政策等冠名为“代理成本”,从而开创了代理成本理论^[7]。

早期经典委托代理理论的焦点问题是:委托人如何选择或设计最优合同来克服代理问题。而这些最优合同包含了几乎所有的或然情况及其行动策略,是不需任何事后谈判的完全合同,因而也就不存在控制权、权威等变量。然而,由于有限理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合同相关变量的第三方不可证实性,合同在现实中是不完全的。合同的不完全性为权威和剩余控制权提供了存在空间,并凸现了由谁拥有权威、控制权如何配置等问题。由此可见,早期的代理理论遵循的是完全合同理论,而现代主流代理理论则以不完全合同为基础。

但是,无论完全合同还是不完全合同,二者都遵守一个共同的假设,即主体的“经济人”假设;该假设认为人总是在寻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人类的行为倾向于机会主义。遵循古典经济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和研究范式,委托代理理论又提出两个基本假设。

利益冲突假设: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的相互冲突,代理人便可能利用委托人所委托的资源决策权谋取自己的利益,即可能产生代理问题。信息不对称假设:由于委托人无法知道代理人的努力水平,该水平即使能够观察到,也不可能被第三方证实,代理人便可能利用自己拥有的信息优势,谋取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而可能产生代理问题。

按照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逻辑,委托人为了实现自身财富最大化,将其所拥有或控制的资源的某些决策权授予代理人,并要求代理人提供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服务或行为。但是合同的不完全性、利益冲突和信息的不对称性促成了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理性的代理人可能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委托人利益之上,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与此相关的代理威胁包括:道德风险(如搭便车和偷懒的动机,以临时津贴等形式寻求额外报酬的动机);要挟(如所有者兼管理者利用来自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权力强迫代理人接受并非其利益最大化的变革);逆向选择(如隐藏或提升不合格个人的风险)。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委托人就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制衡机制来规范、约束并激励代理人,限制代理人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敲竹杠等机会主义行为,协调双方利益冲突。

2 传统代理理论视野中的家族企业

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组织形态,家族企业一直受到不公平的漠视,公众对其的评价也褒贬不一。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纵观契约理论和家庭经济学乃至社会学的研究结果,许多人认为家族企业是一种有效率的组织制度安排。理由包括:

1) 家族纽带和血缘关系为信任治理提供有效依托。

交易成本是契约经济学关注的对象。按照契约经济学,市场和企业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治理方式。选择何种方式治理交易,取决于市场和企业两者对节约交易成本的贡献。

有限理性、环境的不确定性、不对称信息和与此相关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市场治理存在失灵的风险。作为市场机制的替代,企业科层治理的主要优势在于雇用关系。以权威安排和监督雇员工作。然而,即便如此,企业科层治理也存在失灵的可能:个人利益和组织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代理问题,机会主义的经理人追逐私利;团队生产特性和产出的无法精确分离和计量导致监督成本也客观存在。

两种治理机制失败的关键在于定价困难所致的高昂的交易成本,而宗族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由于天生的血缘关系,家族是宗族群体中核心的部分,家族成员利益和目标一致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这个角度看,家族企业不失为一种有效组织。

2) 所有权和管理权合一降低了代理成本。

按照 Jensen 和 Meckling 的观点^[7],家族治理也是一种高效率的治理模式,因为:家族企业一般实行所有者管理,两者在利益上是统一的。这种一致性能够有效避免因为两权分离而引起的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所致的代理冲突;私有产权可以降低代理成本。家族企业的所有权集中在彼此具有特殊血缘关系的决策代理人手中,这种私有产权能遏制经理人通过附加消费、额外津贴或低效率配置资源等方式掠夺所有者财富,使代理问题最小化;家族管理也能有效降低代理成本。从事不同管理事务的家族代理人之间由于亲属关系而在相互监督和租金自律等方面具有优势^[8]。正因为如此,家族企业被认为是一种低成本的组织监管形式^[9]。

3) 利他主义降低了机会主义倾向。

代理理论初始的设想是当所有权和经营权在家族内部合而为一时,代理成本最小,因为“家族成员在监管和训练相关决策代理人上具有优势”^[10]。而这种优势的根源在于家族成员的利他行为,家庭成

员会将其自利服从于家族的集体利益。

社会学者把利他主义视为内生于个人基本特征的一种特质或偏好,部分基于感觉、本能和情操。经济学家把利他主义建模成为父母财富和子女财富正相联系的效用函数。

利他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开创性研究是 Becker^[11]。他阐述了利他主义如何并入决策者的效用函数,并提出“坏孩子法则”:即使一个自私自利的、堕落的坏孩子,也会考虑家族利益而工作。“如果存在家族领导,另外的成员也被激励去将家族收入最大化”。显然,如果坏孩子理论成立,家族企业就没有搭便车或代理问题了。

为什么家族成员会从事利他行为?这个问题可以用起源于神学的管家理论解释。

管家理论摒弃了经典代理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认为经理人(代理人)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管家,他们与委托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自我服务的经济个体,通常也是为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利他地行动^[12]。管家们受到为企业集体产品而工作的内在激励,他们认同并接受组织目标,并承诺使组织成功,甚至以牺牲个人为代价。反之,如果管家们被视为机会主义者而被严格控制时,他们会感到沮丧。

这些态度在家族企业特别流行,因为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或者是家族成员,或者在情感上与家族相连。这样的执行经理经常深深地投入到为实现公司使命的努力中去,珍惜其员工和利益相关者,并感受到为所有的家族和组织集体而尽力的激励^[13]。

3 代理理论在家族企业研究中面临的挑战

随着家族企业研究的逐步深入,传统代理理论关于家族企业的假设和观点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挑战主要来自几个方面。

3.1 代理成本概念的重新界定

如果代理成本是因为管理者以所有者利益为代价追求自利而产生的,那么许多在公众公司中归入代理问题的行为在家族企业是否也属此类?例如,如果家族企业的所有者资助亲戚,那么裙带关系在家族企业中不是代理问题,尽管这在公众公司是代理问题。因此,家族企业中代理问题面临一个基本概念界定的问题,代理成本的概念需要重新定义^[1]。

3.2 代理成本来源的复杂化

代理理论把家族企业视为一种高效率企业,当所有者直接管理企业时,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成本最低。所有者管理的企业因此没有必要防范代理威胁。但这种结论基于两个假设:所有者管理是对两权分离企业中控制管理者机会主义的治理机制的有效替代;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是代理成本的来源^[14]。

但是,现在的研究表明,代理成本不仅仅来自两权分离。代理问题也存在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Morck等则在代理问题中加入了主要股东和少数股东之间的问题^[15],这种控制性股东和少数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已逐渐成为目前研究的主流问题^[16]。两权合一的家族经营模式虽然可能降低所有者和管理者利益冲突所带来的代理成本,但也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家族股东掠夺问题^[17]。另外,Lubatkin等提出私人所有并由所有者管理的企业中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要挟等代理问题的产生原因恰恰是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两权不分^[18]。

3.3 利他主义的负面影响

表面上,管家理论和利他主义的思想与代理理论对家族企业的观点不谋而合:管理权和所有权相连的情况下企业没有必要建立正式的治理机制。

与利他主义和私人所有权相关的代理问题包括^[18,19]:但是,Schulze等、Lubatkin等在综合Stulz^[20]等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利他主义、私有所有权和家族管理使家族企业暴露在代理危害之中,由此引发的问题甚至比在公众公司出现的类似问题更严重^[8,18,19]。

家族关系的嵌入,使得家族企业的代理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公众公司,甚至不同于一般的私人公司。参照Lubatkin等人的分析^[18],家族企业面临的代理问题可以用图1简单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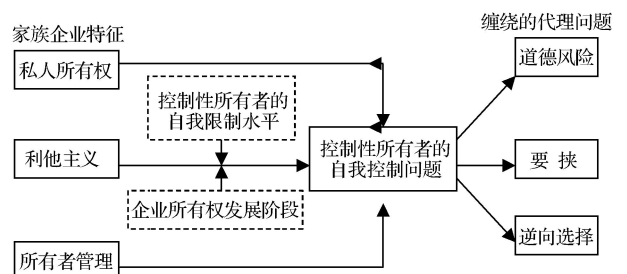


图1 利他主义对家族企业代理问题影响的概念模型

3.3.1 自我控制的代理威胁

作为“自我的代理问题”,自我控制问题的产生

是因为个人缺乏远见,不完全理性或不受很好地约束。更正确的说,因为冲动、感情用事和环境变化,个人倾向于采取危及自身财富的行为。简单说,个人有动机去做想做的,而非自己应该做的,或者承诺要做的。

父母与子女之间不对称的利他主义将带来代理问题。家族契约使委托人无法有效监督和约束家族代理人,使契约难以执行,从而面临“撒玛利亚人困境”。利他主义部分来自于提高其财富的愿望,父母则有动机溺爱子女,并采取一些与父母意愿无关但鼓励子女搭便车和偷懒的行为(如把家庭琐事留给父母做,或者挥霍父母的钱财)。利他主义使父母对子女的知觉产生偏差,这种偏差又反过来阻碍他们监督和约束子女的能力。利他的父母采取的行动将激励受益人采取最终危害其财富的行动或决策。

3.3.2 逆向选择

父母的利他也能恶化逆向选择问题。利他和自控制问题使控制性家族企业面临劳动力市场的自选择或自分类效应,从而导致逆向选择。只要企业的劳动合同条款系统地限制了劳动力资源库的规模、特征和质量,自分类过程就会发生。

第一,利他主义和私人所有权使家族企业不愿稀释控制权,因此不可能用股票期权等作为报酬,让非家族的代理人相信所有者不会利用他们^[21]。这使得企业面临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明显低于公众公司所面临的市场的竞争力。因此,利他主义导致劳动力外部市场失灵,提高了家族企业雇佣低质量代理人的风险。

第二,利他使家族企业不愿向非家族代理人提供晋升机会。因为选拔标准一般基于家族身份,而非代理人的决策技能和承担风险意愿。血缘关系不仅把家族企业置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地位,也使内部劳动力市场引入了逆向选择的威胁。后者是由于利他主义的偏差,而非信息不对称。但结果一样:家族企业雇用低质量的代理人。

总之,劳动力市场的无效率导致家族企业面临管理者能力不足的代理问题。

3.3.3 道德风险

在家族企业中同样存在家族代理人、少数股东的搭便车、偷懒和“自我服务行为”^[15]。

父母的利他主义和自控制问题可能影响其如何运用企业资源的决策。例如,典型的家族企业提供给家族成员在其他地方不可能得到的有保障的就业、临时津贴和特权等。因此,父母的利他主义和控

制性所有者的自我控制问题一起,可能会恶化家族企业的私人所有权和所有者管理相关的道德风险的代理问题。

3.3.4 要挟

当家族所有者不受约束的任意决策和控制权相结合时,控制性所有者的决策常常影响少数股东的利益。由于私人所有权相关的流动性缺陷,少数股东面临高昂的退出成本,这使他们在面对家族控制性股东侵占时无法用脚投票,增加了控制性股东“要挟”的可能性,也使得股东间的冲突永久存续。同时,也促使小股东和代理人道德风险的滋生,即搭了控制性所有者管理的便车,并鼓励少数股东投资不足。业主管理者的这些反复无常的行为将破坏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声誉,使其难以找到合格的员工,这又加剧了逆向选择的代理问题。因此,这些行为提高了冲突,降低企业生产率。

家族代理人同样面临很高的退出成本,更易于被要挟。这些家族代理人的股份缺乏流动性,退出企业则意味着放弃利他者给予的宠爱以及在家族企业工作所能得到的另外的津贴、特权等。更进一步,家族代理人离开企业可能放弃继承权(至少减少),放弃的不仅仅包括股份或另外的企业财产,还包括其他所有由于和家族、企业保持紧密关系所可能得到的利益。最后,可能最重要的是,家族代理人离开企业可能要承担与失去亲密关系、降低地位、打破家族期望以及家族纽带相关的巨大的成本。因此,父母利他和自控制所带来的挑战——诸如无效的治理、搭便车和偷懒的动机等——将持续存在。

3.4 治理机制效率的弱化

由上述分析可见,家族企业同样存在广泛的代理冲突。与一般公众公司相比,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甚至存在恶化的趋势,因为私人所有、家族管理和利他主义的结合将削弱正式治理机制的效率:

首先,私人所有权提高了监督成本。

有限的晋升机会和报酬减少了代理人监督他人行为的动机^[22]以及为了发展而相互竞争的动机。控制权的不可竞争也提高了家族企业的绩效监督成本,因为资本市场不能决定股票的价格。把企业从控制权市场约束的压力中解放出来^[20]，“在事情变得严重之前调整就非常困难,在有的场合甚至无法解决”^[23]。因此,私人所有权并非治理万能药,尽管很多代理学者认为大宗股权和所有者管理的代理利益是真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结合使私人企业面临在两权分离的公众公司假设为不成问题的代理冲

突。

缺少了外部市场的约束,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将提高,并造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由于私人企业与竞争性资本市场隔离,利益相关者(股东等)退出私人企业的成本很高,因而这种冲突很多是永久存在的。如果控制性所有者存在严重的自我控制问题,这种冲突将恶化。

其次,利他主义影响激励机制的作用。

利他主义将破坏控制性所有者采用激励手段激励家族代理人的能力,以及把他们的偏好统一指向成长及风险承担的能力。在家族内,激励的原则基于平等和互惠(但对非家族代理人,激励的原则在于权益比例),而这给予每个家族成员相等的资源索取权。他们均等得到食物、保护、财富、爱等的权利不会因为其对于家族财富的贡献不同而有所变化。事实上,借助家族的力量把家族成员对家族的贡献和他们得到的利益暂时分离开来,这样就可以照顾那些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家族成员。

但是,家族企业中这些规则和交易关系与治理非相关代理人之间关系的规则相冲突。家族成员知道,他们所创造的边际财富,也是他们更有资格得到的财富,将按照父母——也即控制性所有者认为合适的方式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但是给予家族成员固定工资的决策,或者只给家族成员临时津贴的决策,能制造冲突和怨恨^[24]。Bergstrom 也注意到,给予已经离开家族、被剥夺继承权、最终穷困的子女爱和家族身份,利他的父亲不经意间惩罚了其他忠实的儿子,后者在父亲的企业工作,并知道以后他将继承自己劳动的成果^[25]。

综上所述,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嵌入于以利他主义为特征的、在家庭中建立起来的父母-子女关系中。利他主义和私人所有权、家族管理等特征相互缠绕,使传统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冲突被作为委托人的父母与家族代理人之间的冲突所取代。外部市场的失灵和自我控制问题凸现,使家族企业比公众公司面临更多的代理问题,而这些代理问题的类型和内容将随家族企业所有权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迁。

可以说,利他主义的引入使代理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家族、企业两个系统的交互作用在利他的环境下使得代理问题更加复杂化,也导致人们质疑传统的被认为能有效约束代理问题的治理机制在家族企业中的效率。

参考文献

- [1] CHRISMAN J J, CHUA J H. Pramodita Sharma current trend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family business management studies: toward a theory of the family firm [Z]. NBER Working Paper, 2003.
- [2] GROSSMAN S, HART O.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 691-719.
- [3] RAJAN R, ZINGALES L. Power in a theory of the firm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 112 (2): 387-432.
- [4] 张维迎. 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1.
- [5] 杨其静. 合同与企业理论前沿综述 [J]. 经济研究, 2002 (1): 80-88.
- [6] ROSS S.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ency: the principal's problem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3: 134-139.
- [7] 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3: 305-360.
- [8] SCHULZE W S, LUBATKIN M H, DINO R N, BUCHHOLZ A K. Agency relationships in family firms: theory and evidence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1, 12: 99-116.
- [9] KANG D. The impact of family ownership on performance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a study of the U. S. Fortune 500, 1982-1994 [Z]. Academy of Management Meeting, Toronto, 2000.
- [10] FAMA E F, JENSEN M C.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a, 26: 301-325.
- [11] BECKER G S.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 1063-1093.
- [12] DAVIS J, SCHOORMAN F, DONALDSON L. Toward a stewardship theory of management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7a, 22: 20-47.
- [13] MILLER D, BRETON-MILLER I L. Family govern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agency, stewardship, and Capabilities [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06, 19 (1): 73-87.
- [14] ALCHIAN A A, WOODWARD S. The firm is dead; long live the firm: a review of Oliver E. Williamson's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88, 26: 65-79.
- [15] MORCK R, SHLEIFER A, VISHNY R. Management ownership and market valu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8, 20: 293-315.
- [16] SHLEIFER A, VISHNY R.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52: 737-783.

(下转第 128 页)

Empirical Research on Determinants of Customer Loyalty in Economy Hotel

Xu Wei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Abstract : On the basis of current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ynthesis theory model about determinants of customer loyalty in economy hotel. Using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t establishes the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about determinants of customer loyalty by AMOS ,and tests it. The result shows that ,customer value ,service factor ,switching cost ,customer satisfaction ,customer trust and customer commitment are the determinants of customer loyalty ;customer value , service factor and switching cost have direct influence on behavior loyalty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customer trust and customer commitment have indirect influence on attitude loyalty in economy hotel. Finally ,it points out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Key words : customer loyalty ;driving factor ;customer value ;switching cost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上接第 121 页)

- [17] MORCK R , YEUNG B. Agency problems in large family business groups[J]. Entrepreneurship : Theory and Practice ,2003 ,27(4) :367-382.
- [18] LUBATKIN M H ,SCHULZE W S ,YAN L ,DINO R N.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altruism on the governance of family-managed firms[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5 ,26(3) :313-330.
- [19] SCHULZE W S ,LUBATKIN M H ,DINO R N. Toward a theory of agency and altruism in family firm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473-490.
- [20] STULZ R M. On takeover resistance ,managerial discretion ,and shareholder wealth[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8 ,20:25-54.
- [21] MORCK R. On the economics of concentrated ownership [J]. Canadian Business Law Journal ,1996 ,26:63-85.
- [22] FAMA E F JENSEN M C. Agency problems and residual claim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b ,26:325-344.
- [23] JENSEN M C. The modern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it , and the failure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J]. Journal of Finance ,1993 ,48(3) :831-880.
- [24] CHAMI R. What 's different about family business ?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 abstracts[Z]. Working Paper Series ,File No. 98061505 ,1997.
- [25] BERGSTROM T C. A fresh look at the rotten kid theorem and other household myster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 ,1989 ,97:1138-1159.

Agency Problem in Family Firms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Agency Theory Oversea

Shi Yujun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 Asymmetric parental altruism ,when combined with private ownership and owner-management ,influences the ability of the firm 's owner-manager to exercise self-control ,which ,in turn ,can expose some family firms to conflicts rooted in the agency threats of moral hazard ,hold-up ,and adverse selection. The interaction of 'family 'and' business 'embedded in kinship and altruism makes the agency problem much more complicated in family firms.

Key words : family firm ;agency problem ;altruism ;self-control